

陇上学人文存

林径一卷

林径一 著 颜华东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 林径一卷 / 范鹏总主编; 林径一著;
颜华东编选.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226-04578-7

I. ①陇… II. ①范… ②林… ③颜…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马克思主义理论—文集 ③教育工作—文集
IV. ①C53 ②A81-53 ③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72749 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李依璇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林径一卷

范鹏 总主编

林径一 著 颜华东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7 字数 270 千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226-04578-7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陆 浩	刘伟平		
主 任：	励小捷	咸 辉		
副 主 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 任：	连 辑	咸 辉		
副 主 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 辑	张广智		
副主任:	张建昌	范 鹏	马成洋	
委 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 范 鹏

副总主编: 王福生 马廷旭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理学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醇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林径一先生原名林廷宦,汉族,安徽省怀远县人,生于1925年12月。1946年考入西北大学法律系。194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在共青团甘肃省委(时称团省工委)从事学校和农村青运工作,于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副科长、科长。1953年7月调中共甘肃省委党校从事理论教学工作,1956年9月任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1957年2月赴中央党校学习。1958年下放基层锻炼,曾在甘肃省武威县担任乡党委书记、公社书记。1959年在反右倾斗争中曾遭受批判。1962年平反后调甘肃师范大学(即现西北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教研组任主任。1973年底调任中共甘肃省委机关党委宣传处处长。1978年8月任甘肃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80年8月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等。

林径一先生是甘肃省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毛泽东哲学研究的资深学者。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林径一先生在理论教育宣传和学术研究的生涯里,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陇上学人中的佼佼者,他先后兼任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第一届理事,甘肃省哲学学会会长,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即现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甘肃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五、第六届委员等职。林径一先生曾被甘肃省人民政府聘为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组成员、甘肃省委宣传部省职称领导小组改革办公室聘为甘肃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特约政策研究员、甘肃省委宣传部聘为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专家及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



林径一先生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工作，孜孜不倦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集党的思想战线上的恪守职责、坚持原则的理论工作者与勤学慎思勇于探索的学者于一身，颇具自己与众不同的长处与贡献。他先后发表论文 50 余篇、出版著作 5 部。其中 1988 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哲学学习纲要》一书，对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与时俱进并具有独到见解的全面而深入的论述。该书于 1990 年获甘肃省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后又称“兴陇奖”）一等奖。林径一先生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有 8 篇被收入《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成果总览》、《中国当代社科文献·改革发展文论》、《中国改革开放优秀理论成果选》等十多部大型文献丛书。其中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00 年第 6 期中的《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一文，在当时的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好评如潮，曾数次在全国各地学术论文评奖中荣获特等奖和一等奖。

由于林径一先生多年来的理论研究成果，在省内外理论界的影响与日俱增，林径一先生自 1992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享受正厅级待遇。他的生平事迹先后被收入《中国哲学年鉴（1987）》、《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等 50 多部重要的辞书中。1996 年离休至今，仍勤于思考、笔耕不辍，可谓是学有所成、实至名归。

大凡一个有良知学养和勤于探索的学者，他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是可以循迹探知的。有他的心路之旅中，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径一先生写于 1981 年 7 月的一篇论文——《论当前我国哲学战线上主要的斗争锋芒》，这是当年他参加由中央党校牵头在大连

召开的全国党校系统第二届哲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其时的社会背景是,1978年在邓小平亲自倡导的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在思想理论界开展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活动;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被彻底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生气勃勃地从各个领域向前推进。然而在当时,可以直白地说,理论或思想落后于现实,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思想与实践的倒挂却不为当时人们所察觉或重视。“左”的思想在理论界、学术界的禁锢却并未“松绑”,它像幽灵般地时隐时现,依然存在着一股思想暗流,有人认为“左”的路线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是不对的,然而占主流地位的理论特别是哲学却不存在偏差,是不容怀疑的,这也许就是所谓社会意识独立性的一种现实反映吧。

林径一先生具有较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造诣,他以一个资深理论工作者的睿智与敏锐,从知与行、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前提,提出了“当前我国哲学战线上主要斗争锋芒”的论题,确实切中时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先知先觉者。

在论文的导言中,林径一先生首先尖锐地指出:“为什么在我国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居于统治地位并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的情况下,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却能够几度大肆泛滥,给革命和建设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害?唯心主义思潮的泛滥与形而上学思潮的猖獗之间有些什么样的联系?这涉及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起了重大变化之后,哲学上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思想影响之间的斗争具有哪些特点。只有认清这些特点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逐步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他一针见血地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泛滥总是和形而上学思潮对唯物辩证法的干扰结下了不解之缘”。对照新中国成立以来“反右派”、“大跃进”及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大的失误,都是“由于偏离唯物辩证法因而由形而上学的诡辩论最终导致唯心主义的”,这就是它们共同的认识根源,“在我国条件下,哲学领域里的两种思潮斗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主要是凭借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表现出来的”。

林先生进而剖析道:“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之所以往往成为扩大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桥梁,是由于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直线性是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摆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包含着大量课题的必然王国,然而“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直线性和片面性造成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迷误”,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认识,并且突出表现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多年来我们经济工作中的片面性绝对化比比皆是,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林先生又强调指出:“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唯心主义思潮利用形而上学发展自己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抓住形而上学否认或忽视主观能动作用的缺陷,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混淆它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以假乱真。”

在论文的结尾,林径一先生在分析了形而上学存在的思想认识和社会历史根源后,他说:“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我国还具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我们要扫除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确实是一项特别艰巨而持久的战斗任务。”他进一步指出:“为了在实际工作中更加有效地清除唯心主义思想影响,不断扩大辩证唯物主义的阵地,在当前明确地批判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作为开展哲学上两条战线斗争的首要任务,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的要害是不指名地批评了毛泽

东晚年哲学思想的偏差,用画龙点睛之笔指明了本文的中心论点。

林先生的这篇论文自始至终处处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鲜明特点,以党内资深理论工作者的经历或经验,积几十年的造诣与探索,厚积薄发。现今的人们可能已经不甚了解当时的背景,其时在思想理论领域,保守僵化之风尚有余威,极左时期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使人心有余悸,因此,由于这篇论文与传统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区别,现在看来并无惊人之语,但撰写时仍需一定的理论勇气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为林径一先生其后专心研究毛泽东的哲学特点奠定了基础。这篇论文的问世已经三十多年,回顾大致相同时间改革开放的进程,回溯哲学界经历的风雨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研究的进程,尤其是它在乍暖还寒青黄不接之时的脱颖而出,仍然是发人深省,启迪良多。

仍有必要再交代一下,林先生提交的这篇论文当时并未受到会议主持者的青睐,会后编选的论文集也未收入其中,个中的原因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可谓明珠暗投,但其真知灼见的光芒却是不可磨灭的。

在林径一先生一系列的著述中,特别是应该看重的,是他发表在《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的论文《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它是林先生深思熟虑的最富学术成果、最具鲜明特点的扛鼎之作,也可视为其后出版的最具代表性的专著《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发展简史》简明扼要的提纲式的总结。

林先生在论文一开首就开门见山地指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无论是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还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成就和挫折,他的政治实践和他的哲学思想都是异常紧密地直接相联的。”并进而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政治服务的直接程度,不仅为古往今来的一般哲学所未有,而且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也有所不及的。”但这还不是林先生的全部



论点,他接着进一步强调:“而对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来说,还只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直接服从于政治的。”对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做出了犀利明确的结论,这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研究中,确乎发前人之未见,不仅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而且也是林先生积几十年的经历与思考的结晶。

这篇论文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历程的角度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梳理,有力地论证了毛泽东哲学这一根本特点的来龙去脉。

论文提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由一个唯心论者、二元论者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者,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实现这两个转变的根本动力就是他的以爱国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发轫之处就是与他的政治思想紧密相连而又从属于政治思想的。其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依然沿着这条轨道前进,仍然是在政治实践的推动下才不断得到发展的。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础的毛泽东的哲学为全党所接受,它是在服从与服务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和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这篇论文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不是以往陈陈相因、满口溢美之词的平庸之作,它的理论重心是以分析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哲学的偏差或失误。论文以翔实的论据,证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成为它的发展高峰,但另一方面却开始逐步地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而且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空前的混乱,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造

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样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哲学都是直接服从和服务于他当时的一系列政治观点和政治路线的，毛泽东哲学的这一根本特点较之以往各个时期都更为突出。

本文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同样应该特别值得重视和肯定。林径一先生明确指出：“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之所以出现某些偏差，是由于他削足适履，使自己的哲学思想一味地服从和服务于搞没有完全摆脱掉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归根结底则在于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论文同样大量列举了一系列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中的失误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失足之处就在于，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原理，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违背了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林先生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突出表现在实践中的急于求成。为了解决党内认识上的分歧，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简单化，片面地竭力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夸大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错误，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都是按照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需要率性而行、任意发挥的。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失误毫无疑问在哲学上导致主观主义，林先生鞭辟入里地指出：“毛泽东的这种主观主义，既不同于历史上的教条主义那样一味从书本出发，也不同于历史上的经验主义那样一味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它虽然或多或少具有某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但在根本上却是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作为其主要特征。”这一段话语确系本篇论文画龙点睛之笔，毛泽东的一系列